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诗经·小雅》

学《诗经》，读这首小雅时，只在公园见过鹿，没听过鹿鸣，想象一定如雀鸟鸣叫，如音乐一样美妙，姿态优雅。以后看到一幅画叫《秋林群鹿图》，是五代时的名画。画面上八九只可爱的梅花鹿，在野林深处嬉戏、鸣叫、静卧、奔跑，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观此画时，不由得想起“小雅”的“鹿鸣”，似进入了优雅的鹿的仙境。但这是古代的画面，现代呢？听说长白山林区有的县办起养鹿场，那是在大圈里饲养，如奶牛场、养猪场。我从小学课本上知道日本有个奈良公园，园中有鹿群，不圈养，可在公园内自由奔跑，任游人抚摸、逗弄。不过这也只限于公园里，日本的山林里有群鹿飞奔吗？没听说过。我不是猎人，不能像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里所描写的那样，身临其境在苍茫林海里，在大自然中自由徜徉、自由观赏。多么希望在现代的山林里也能出现古代的“秋林群鹿图”啊。

金秋十月，我却在辽北山乡看到了比古名画还要迷人的“秋林群鹿图”，听到了呦呦鹿鸣声。

登上长白山余脉的凤翔山麓，正欲一览醉人的秋色，忽听山下传来“呦——呦”的长鸣，间杂着清脆的银铃声。两名系着红领巾的少年赶着一群梅花鹿走来了。随着牧童的一声哨音，鹿群争先恐后追逐潺潺流水，欢畅痛饮，尽情嬉戏。看那顽皮者，边饮边用前蹄拍击浪花，追追打打；善斗者，头对头顶起角来誓争高低；好食者，埋头啃着河边嫩草，细细品味；欢乐者，伴着哗哗水声引颈高歌，逍遥自在。那刚被锯齿、头顶嫩角的小公鹿，竟将宽宽的额头伸进水中冲洗，而后凝神细照，是不是在奇怪：自己原来那珊瑚枝似的美丽茸角哪里去了？那项带响铃的头鹿，泰然四望，是在欣赏这金霞满天、层林尽染的绝妙秋色？还是在倾听远处忙于秋翻的拖拉机的轰鸣……

这现代的“秋林群鹿图”，该是哪一位丹青妙手的佳作？我情不自禁从山腰蹦跳下来。未料，群鹿惊炸，有的越河登山，有的仰首尖叫，有的竖耳瞪眼，有的粗尾上掀，那大张的羽扇似的白毛，好似扬起警备的白旗。我忙隐于树后。“呦——呦”，又一阵动听的长鸣，惊掠的小鹿相继停步。只见从柳丛中走出一位头发花白、肩宽腰挺的壮实男子。仔细看去，原来是大队书记张殿奎，一位曾于前几年相识的熟人。当年同他匆匆分手后，方知他是锡伯族人。我忙上前同他紧紧握手，急问：“这鹿群是……”

“我的。”他说。

“你的？”下边我未出口的疑问是：你们的鹿不是处理了，鹿群不是散了吗？

好几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我第一次来到辽北地区最偏远的凤翔山村。当时一路直走到大队书记张殿奎家，推开大门，见院里拴着羊，趴着狗，跑着鸡鸭，木栅栏里还站着一只小鹿。这鹿，头顶着一对血色的毛茸茸的锥角，撇着白唇嘴巴，瞪着乌亮的圆眼睛，警惕地望着我。我好生稀奇：林中野兽怎能同家畜同院共处？我向张殿奎提出这个疑问。他笑笑，没马上回答。

他的老伴在一旁却先开了口：“说的是嘛！集体的鹿场赔钱了，说什么国际市场鹿茸跌价，不如把该杀的鹿杀了卖鹿心、鹿鞭，当药材卖更值钱。腾下人手出外打工，多省心。”

“尽图省心，那能致富吗！”张书记顶撞老伴一句。

我问：“你的办法呢？”

“分散承包，家养。”他答。

我又问：“鹿是野生的，能和猪、牛、



呦呦鹿鸣

□赵郁秀(满族)

羊一样家养吗？”

“就是嘛！”老伴马上接话：“咱庄稼人从老祖宗起就会种地。可养鹿，咱祖宗八代谁家养过？”她转过身向我说：“他尽想巧，人家给他绰号叫‘张想巧’。”

我笑了，觉得张想巧这名字挺好。

张殿奎反问我：“你知道我们这地方从前叫什么名儿吗？”

我摇摇头。

“从前归西丰县管辖，叫逃鹿！”

逃鹿！县志有记载。清朝入关后，这里曾被圈为御围场。光绪年间才开禁、招垦。传说，一次亲王出关祭祖，兵马护驾前来围场狩猎。一御猎官身披鹿皮、头顶鹿角隐于丛林，模拟母鹿鸣叫，换来众多公鹿。亲王大喜，拉弓疾射，假鹿射死，真鹿奔逃。从此得名“逃鹿”。

张殿奎在赶猪、放羊的孩童时期，就听过这个传说。也听爷爷说过，“打牲族”天生爱骑马射猎放牛羊，他打小就有这个爱好。上山放羊、采蘑菇时，常往老林深处钻，故意放大嗓门呼喊，幻想能像传说的那样，呼唤来活蹦乱跳的小金鹿。可他一次也没有见到鹿的影子，却听了无数的童话故事：鹿吃人參果，鹿盗灵芝草，鹿奉月宫，鹿救猎人……多么善良的小动物哟，何时能回归凤翔山林？

张殿奎向我说：“农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一只鹿好多钱，养不好钱砸手里，谁兜着？”

我问他：“你敢兜着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带我到队上的鹿圈去看看。

我们站在鹿圈墙外，望着圈里的鹿群。淘气的小仔鹿，温顺的鹿妈妈，还有那剽悍刚猛的大公鹿，都向张殿奎奔来。他摸摸它们光滑的皮毛，扯扯它们的耳朵，自语似的说：“现在有人要把你们当药材换了我，我多想带你们回到大自然，在广阔的森林里自由奔跑啊。”

跟随我们而来的老伴又向我说：“他天性难改，对牛羊、对小鹿比对自己的儿女还疼还爱啊！可是马上换不来钱，光想着抱着有啥用啊？上边新来一位领导支持把鹿场处理掉，马上能见现钱，多省力呀！”

张殿奎长出一口气，望望妻子没再言语。

我来凤翔是应一杂志之邀写一位人物的典型材料，妇女队长找我到乡里去，我便同张书记一家分手了。路上，妇女队长告诉我，张书记是锡伯族，他爷爷娶了本村闯关东人家的姑娘，就独自落户到这里。据说，沈阳郊区有两个锡伯族自治乡，都说那是200多年前从北边“随龙过来”的，是“打牲部落”。

噢！原来张殿奎是“打牲部落”的后裔。

我又问：“鹿是野生的，能和猪、牛、

我赶忙告诉他我曾去过沈阳正在修复的锡伯族家庙。

“什么时候开放？”他急问。沉思片刻又说，他对本民族的事情知道得太少了，只记得锡伯族的老祖先是“喜利妈妈”，张姓原姓为扎库里氏，以后锡伯人随满、随汉都改成单姓了。我说，“喜利妈妈”是锡伯部落母系氏族社会的祖先呢。

我的话音未落，张殿奎的老伴风风火火赶来，快言快语大喊：“欢迎，欢迎！多少年不见，看我们这有大变化了吧？人家说咱老张家坟头冒青烟了。我们这共产党员要成大老财了！”

“好啊，共产党员就是要带头富起来嘛，别像当年愁眉苦脸的，现在该眉开眼笑了吧！”我说。

“噢！我们现在有笑又有愁了……”

“当初你磨破嘴皮动员他们承包，他们不干，等着看我们家的笑话。今天见钱眼红了，哼。”女儿插嘴。

“嗨！我就盼着他们眼红。他们眼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不能光顾自己家富，要帮助四邻一起富裕。起个带头作用才对嘛！”张殿奎说。

原来，这位张殿奎书记要把自己承包的，经过全家几年辛苦饲养由瘦弱变强壮的20多头鹿，分拨给那些当初不愿、不敢甚至反对承包，而今又渴望养鹿的农户，特别是那些困难户。没钱还本，可先欠着；无力建圈，他先代养；饲料不够，他借给；不懂技术，他传授。实行“三保”——保养好鹿，保多产仔，保收好茸！这位当初被人称为“想巧”的书记想得多么周到、多么细巧啊！

“要拨，我不给头鹿，今年它的二杠（两年生佳茸）卖钱最多，明年出一等三杈（三年以上佳茸）。”儿子说。

“我不给小白唇！”女儿也说话了，“它最美，最好看……”

爸爸笑了：“好的留给自己，差的给别人，这叫什么发扬风格？”他转脸看看我又说，“等沈阳的锡伯族家庙开放了，我一定带你们去看看，拜拜我们的老祖先‘喜利妈妈’。对了，为什么她让我们把狩猎叫‘打围’？”

“瘸子打围坐着喊嘛！”儿子抢先回答，还比画着射击姿势。

“嗯哪！几百年前在山林里供奉‘喜利妈妈’的日月，就是不分你我、不分强弱，大家围着打猎，平均分领胜利果实。”说着，他顺手从兜里掏出本语文课本，“咱锡伯族的老传统故事，我知道不多，给你们讲得也少。讲讲现在吧！”他打开课本，“这是你们念过的书本吧？这篇《松树的风格》，你们念过、背过，还写过作文吧？写的是什么来着？”他慢慢朗读：“我家门前是松树的海洋……”

儿子、女儿不约而同地都抬起头，默默注视着门前，四周是逶迤的群山、苍茫无际的松海，那巍巍挺拔的红松、郁郁葱葱的黑松，一方方、一片片，在涂上秋色的金黄灌木林和草场的衬托下，显得更加青翠、高洁、苍劲。是的，他们作文歌颂过松，也表演歌唱过：愿做高山一棵松……

张殿奎，善“打围”的锡伯族书记，和一双儿女将他们心爱的头鹿、白唇鹿等18头最好的茸鹿和母鹿分拨给一些困难户饲养了。党员一带头，群众有劲头。一些从前连猪、羊也养不起的贫困群众，养起了价值几千元的小金鹿。村子里，房前屋后，重又响起了呦呦鹿鸣声。

每天下午孩子放学后，便响起金鹿们等待的哨声。他们将自家和无劳力、不善饲养的农户的金鹿都集中来代他们放牧，每天都展现出一幅现代的日新月异的“秋林群鹿图”。

那郁郁葱葱的黑松林，那金色闪闪的柞树林，那红绿蓝紫相交的杂花林，迎着夕阳摇曳着枝叶，相伴着金色鹿群，衬托着清冽冽河水的叮咚响声，围奏出一曲多声重奏的鹿鸣曲……

《民族文学》1982年10月号发表过我写的散文《鸡血水浇灌的索玛花》。其中写到，1935年5月，红军万里长征强渡天险金沙江以后，一路攻占了西昌、越西、冕宁。尾追的国民党军队已进至金沙江一线，前头截击的国民党军队则正向大渡河急进。红军必须迅速抢渡天险大渡河，于是以红一师一团和工农连为先遣队，由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率领，迅速抢占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从冕宁到大渡河，中间隔着大凉山地区，为过大凉山，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和彝族部落之一古基部落的首领小叶丹，在今天称为彝海的海子边，杀了一只公鸡，把鸡血滴进碗里，喝鸡血酒，结盟，使红军顺利通过了大凉山。

而在整整60年前，在全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还出现过一幕值得纪念的喝鸡血酒的情景。

1951年的5月1日，要出席峨山县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峨山县县城报到。第二天开始举行大会，代表、列席代表以及参加旁听的共400多人参加了大会。峨山县的少数民族绝大部分是彝族，5月12日的大会上，成立了峨山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选举产生了县长、副县长和政府委员。

那时候，不管到哪里开会，都要自带被盖，代表们来到县上报到后，被安排在县城里国民党时期县政府的一幢大仓库里，会议筹办部门在仓库里给代表们准备了许多草席和蒲席，代表们每人拉来一床草席和一床蒲席，叠起来铺在楼下的地板上或楼上的木板上，再铺上自带的被盖作为睡床。

吃饭也只是两餐，上午10点开饭，下午5点开饭。晚饭后就不开会了，任代表自由活动。

那天晚饭后在散步时，不知怎的，城关镇的几个汉族代表，和宝兴乡尼达、西舍顶、大法克、小法克村的几个彝族代表相遇在一起了。出席人民代表大会的多是贫雇农出身的农民，也有地主富农中的开明人士，他们会上会下，饭前饭后，时时相聚在一起，可说是十分熟悉了。城关镇的一个汉族代表像邀请亲戚朋友似的邀请大家到他家里去坐坐。

他倒茶、递烟、送瓜子招待大家，大家坐在堂屋里古今中外天南地北侃起闲话来。那些彝族代表与汉族代表相谈时用汉语，跟自己的彝族同胞说话时用彝语。这时，小河乡大甸中、小甸中和西谷村的两位彝族代表和一位汉族代表从大门口的街道上路过，听见屋里又是彝语又是汉语，便好奇地探进头来观望。房主人看见，便热情地招手道：“进来！进来！都进进来！”于是在街道上的人也都进了屋子。

这一来，屋子里的谈话更热烈了！东谈西谈，扯南扯北，他们忽然扯到了解放前的“打冤家”（械斗）。

解放前峨山县有一些地方经常发生械斗。城关镇汉族中的周姓人说尼达、西舍顶、大法克、小法克一带的山是周姓的山，周姓的祖坟建在这一带的山上就是个证明。周姓人经常在这些山上砍树、摘果。尼达、西舍顶、大法克、小法克的彝族不服，经常发生械斗。无独有偶，距城关镇和尼达、西舍顶、大法克、小法克仅20里路之隔的大甸中、小甸中和西谷三个村里的邱、师两姓彝族，也常与大甸中、小甸中的王姓汉族发生械斗。原因仍然是山林的权属问题。为了抵御对方，双方还请人来助战，并派出代表逐级打官司，最后把官司打到了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据说把官司打到南京也没个结果，去打官司的代表却被悄悄地“藏”起来了（杀害了）。这些械斗都由山林问题引起，当时山林仅仅由械斗双方个别的地主拥有，而械斗中流血送命往往是最贫穷的农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山林是大家的了，之后进行土地改革，把田地分给农民，山林也跟着分给了农民，械斗成为了历史。

此刻，在城关镇这个汉族代表的家里，那些出席峨山县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汉族、彝族代表越谈越亲热，一亲热就想喝酒，想吃一顿宵夜饭了。于是主人提了酒来，割了猪肉来，还宰了一只大公鸡。当鲜红的鸡血滴进接血的碗里的时候，汉族代表、彝族代表都不约而同地提出：喝鸡血酒把双方民族的团结亲密巩固下来。

说一不二，他们真的倒出一大碗酒，把鸡血滴进酒里，汉族代表、彝族代表你一口我一口地依次喝起来了。

红军万里长征时刘伯承与古基小叶丹在彝海边喝鸡血酒结盟，是以彝海的水代酒；今天峨山的汉族、彝族代表喝鸡血酒表示团结亲密，喝的可是真正的酒呢！当年刘伯承与古基小叶丹在彝海边喝鸡血酒结盟，是要继续万里长征，夺取革命胜利；如今出席峨山县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这些汉族、彝族代表在峨山县城喝鸡血酒，为的是确认大家都是国家的主人翁，各民族紧密团结，不再“打冤家”了。

是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真正结束了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经常打冤家的局面，如今60多年过去，各民族之间有的只是越来越亲密的团结。

茶香润土家

□谢群山(土家族)

高亢，极富特色，让群峰反弹出阵阵回音，完全可以与《青藏高原》媲美。

有一年春天，茶乡组织了一个规模盛大的歌会，你方唱罢我登场，千人唱，万人和，对了整整三天茶歌，淋漓尽致地表达喜悦之情，表达对天地赐予茶叶这样好东西的深深感恩。多年后，参与当年盛况的家乡人仍对此记忆犹新。记得我上小学时，春夏课余走进集体茶园，帮大人采茶，常常沉浸在那一片歌海中。

儿时，家乡的土家人对制作茶行情看好的红茶，自家几乎不饮用，据说都卖给了苏联人和蒙古人，以助其消化肉食。后来，市场行情大变，虽然原材料一样，绿茶却比红茶利润更好。五峰土家山茶的茶商就开始纷纷打出自己的旗号了。

对土家文人而言，茶在精神层面的感受是具象的，明朝土家诗人田九龄《茶墅》诗云：

霞外独尝忘世味，
丛中深构避喧亭。
旗枪布处枝枝翠，
雀舌含时叶叶青。

一年一年，山里土家人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好，而土家人也在努力让“绿米粒”、“红花朵”一样的土家香茶像土家茶文化一样，传达天地的气息，滋润世人的心灵。

昏暗中的期待

□赵晏彪(满族)

了不对的以外，他们也做过一些好事，这样就不至于理解错了。

周恩来还谈到，任何民族都是有民族心理、民族感情的，辛亥革命以后推翻了清朝，整个满族抬不起头来，他们用汉文、改满服，有些人改了姓氏。从形式上看，汉人和满族人最没有区别，但实际上，满族还是有自己民族感情的，不能设想，满族和汉族杂居了200多年，今天满族就已经没有特点，完全和汉人一样了，没有区别了。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中没有邀请满族代表出席，这是一个错误。当时认为满族已经没有什么特点了，可以不作为一个民族单位。

正是周恩来发现问题后，提出“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政协全国一届二次会议的时候，才有了满族代表的席位。可见

我们在承认满族的问题上，是经过了一段曲折的过程的。

这段文字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周恩来在“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问题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后来的政协会议上，老舍先生、梅兰芳先生等满族人士一一出现在了会议

上。

读这本书，我的思绪从满族想到了清朝，想到了康熙，他的民族政策至今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除了削平三藩，统一台湾，划分中俄边境，将中国的版图扩大到1000